

SICRF 产业集群研究前沿系列著作
Series of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Frontier



文化根植性 与产业集群发展

魏 江 向永胜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产业集群研究前沿系列著作

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发展

魏 江 向永胜 等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0773099)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编号:J20110393) 资助出版

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基金(编号:2013C35079)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经济行为嵌入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经济活动受背后文化动因的影响较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不同区域而言,其传统文化具有很大差异。区域文化的这种差异是如何影响到区域内集群的发展和创新的?从这一问题出发,本书作者历经数年,深入到浙江省多个集群,从对区域文化维度的扎根研究开始,从静态功能和动态演进过程两个不同视角,采取大样本问卷统计分析和历时性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探索文化根植对集群企业和集群整体创新及成长差异的内在机制。本书的研究比较得出了区域文化特性的六个维度和文化根植的两个维度,并发现文化根植通过作用于集群企业结网及学习行为两条不同路径,进而导致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差异的内在根源。从文化根植与集群整体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根植是一把“双刃剑”,文化根植和集群演进早期可能出现共演耦合,有助于集群良好发展,但可能导致后期共演锁定并阻碍集群发展,进而分析文化过度根植的原因并提出适度根植的思想。

本书可以作为集群创新、创新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学习研究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发展/魏江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产业集群研究前沿系列著作)

ISBN 978-7-03-041936-1

I. ①文… II. ①魏… III. ①民营企业-产业化发展-研究-浙江省
IV. ①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591 号

责任编辑:魏如萍 / 责任校对:胡小洁
责任印制:霍 兵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3/4

字数:277 000

定价: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产业集群研究前沿系列著作”

编委会

顾 问：许庆瑞 吴晓波

主 任：魏 江

副主任：蔡 宁 郭 斌

委 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杜 健 金 珺 孔小磊

寿涌毅 邬爱其 吴结兵

徐 蕾 郑 刚 周泯非

序 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统一市场的基本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和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贸易保护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挡其他国家对于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产业的强烈冲击，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下，后发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如何去获取和维护其竞争优势？依托什么样的产业组织形式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又通过什么路径实现后发企业的创新追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根植于地方性的产业集群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Porter（1990 年）指出，集群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正在支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从美国硅谷到中国台湾新竹，从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到德国的巴登-符腾堡，从印度的班加罗尔到巴西的西诺斯谷，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无不闪烁着产业集群的耀眼光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不断上升，出现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如广东的电子类产业集群、苏州地区的 IT 产业集群、浙江的纺织服装类产业集群等。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也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集群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脉”、“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集群无论在国家还是在区域层面对提升经济竞争力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外，产业集群的发展也为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和挑战。作为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以产业集群为中间组织形式的创新行为，是集群内各种从事知识生产、分配和应用的组织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内组织间如何构建起知识创新的集合体，各个企业可以依赖于这样的集合体，产生比个体更加有效的创新产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基于组织间网络的集群创新过程体现了现代互动性创新的系统特点，代表了一种简化的国家创新体制，为此，揭示出产业集群创新的内在机理、演化规律是理论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看到产业集群巨大生命力的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产业集群正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如来自发展路径依赖的转型困境，来自过度竞争的同质战略困境，来自创新溢出的创新动力弱化，这些困境是产业集群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惯性的结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一个区域、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产业的消亡或者破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的破产、中国大三线建设时期开发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中国浙江省乡镇传统产业整体面临消亡。客观地面对现实，笔者把产业集群创新的问题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创新基础体系存在的低端资源路径依赖突破困难。集群创新基础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各类创新资源，即知识、人才、科技等有

机整合的软件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但我国大部分区域内部出现低端资源路径锁定现象,而且这样的锁定要突破非常困难,有的区域甚至出现逆向转型升级现象。二是创新协同体系存在链式分工协作创新难以形成的困局。由于产业链短,集群企业基本处于产业链中的中间制造环节,本来可以协同出优势的准市场组织形态内,现在却出现内部整合局面,不断把前向、后向企业收购、并购进来,不断挤占前后节点企业的有限利润空间,企业间拼命压价,合作关系难以维持,链式创新活动被不断瓦解。三是创新动力体系存在龙头企业引领创新功能弱化格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一个美国或者欧洲的旗舰企业可以引领或带动全球产业的发展。但是,这条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比较长,要想找出一条企业能够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路还要等待探索,还要努力。目前产业集群内的龙头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而且龙头企业与周边企业之间不能形成设计—制造—服务的链式关系,这些龙头企业就很难带动整个集群发展。

要解决以上所述的产业集群创新体系三大问题,必须要构筑起具有较完善的创新基础体系、创新协同体系和创新动力体系的区域创新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不断实现创新知识网络及其服务网络的超本地拓展,以较完善的创新治理机制,为区域内企业参与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我国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创新研究基地,15年前就意识到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围绕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开始研究。例如,笔者是我国最早提出“集群创新系统”的学者,蔡宁教授也是最早提出集群风险系统的学者,吴晓波教授则很早就关注集群内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行为。于是,在产业集群研究上,开始形成“浙大流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吴晓波教授、蔡宁教授和笔者为首的创新基地团队观察到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现象,并从产业集群中的网络结构、创新体系、学习模式和演进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对集群创新体系的研究,在“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管理”的理论范式下形成了区域创新和集群创新理论体系,为区域和集群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为各级政府创新政策的设计、制定和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推动集群创新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回顾产业集群研究“浙大流派”的成果,笔者组织出版了“产业集群研究前沿系列著作”,本系列著作是创新基地成员在产业集群研究领域辛勤努力、踏实工作的研究成果结晶,它们大多为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成果,以实证研究为主,务实而不失创新。作者们都力图体现浙江大学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求是、创新”精神,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与各界同仁分享探索真理的快乐。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许多制造业集群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阵痛,在国际性竞争格局中,无论在技术、规模、

信息方面，还是在人才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创新，无论是对集群企业还是区域发展来说，无疑都是转型升级的不二出路。本系列著作的出版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国内集群创新的相关研究，深入解析集群创新的内在规律，为促进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对策。

魏 江

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创新研究基地

2014年6月1日

前 言

本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和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项目的申请基于笔者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判断。有的集群持续稳定发展，有的集群则陷入衰退甚至死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产业自身的生命周期、产业升级（产业生态链上的分工变化）、产业转移（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跨区域移动）、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变化（如从低成本的竞争力转向高技术的竞争力）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区域文化根植的锁定。一个开放的区域文化会有利于外部资本、外部技术和人才的进入，有利于产业的创新发展，但也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开放而扼杀本土企业的成长；相反，一个封闭的区域文化，很可能会阻碍企业家的学习和内外部知识的流动，最后导致产业的消亡，当然，也有可能减弱外部力量的冲击而使得当地的企业发展壮大。

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根植在当地的区域文化中的，所以，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好文化根植的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提出如何通过适度文化根植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本书就是在对以上基本命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的系统化整合。重点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①区域文化根植的内涵和表征是什么？②文化根植程度如何测度？③文化根植性是如何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学习行为的？④文化根植性是如何影响集群网络演化的？⑤如何建立适度根植的文化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发展？

结合以上基本问题，本书重点在四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集群演变的动态路径。从动态视角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不同产业集群演变的典型轨迹与特征，揭示导致产业集群呈现不同演变规律的内在原因。第二，文化根植性的内涵、要素和测度。前人研究多次提出了文化根植的概念，但其内涵和测度一直没有突破，原因在于文化概念难以概化和量化，本书借助于现有文化研究的成果和产业集群情境下文化嵌入的形态，通过探索性研究提出了文化根植的要素和测度。第三，分析了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演变的作用过程，从正面和反面两个角度全面剖析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演变的作用机理。第四，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变轨迹的关联模式。基于历史分析方法提出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变的基本特征，考察不同产业集群演变与文化根植性之间典型的关联模式和机理，提出从文化适度根植来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整体思路。以上理论上创新

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升级发展提供政策思路借鉴，为各级政府、相关组织和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思路提供战略指导。

在以上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驱使下，课题组历时四年对我国产业集群的演变和文化嵌入的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的深度调研，从案例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角度，解析了文化嵌入的内涵、结构和特征。以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发展与文化嵌入的内在关系，进而，提出了文化嵌入、集群创新网络演化、集群学习与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以上研究成果对发展产业集群相关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课题组成员的长期合作，特别要感谢徐蕾、周泯非、郑小勇、周斌峰等的辛勤付出。另外，还要感谢金星博士校对了书稿中的部分内容。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是笔者自 2001 年开始研究产业集群以来的第三本专著，是对于以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魏 江

2014 年春于求是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意义	1
二、研究问题	2
三、研究框架	3
第二章 文化根植性理论发展	5
一、根植性理论提出	5
二、文化根植性研究	12
三、文化根植性内涵与测量	25
第三章 文化根植性的要素研究	30
一、文化根植性要素提炼	30
二、文化根植性要素诠释	32
三、文化根植性案例探索：质性研究	37
第四章 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网络	48
一、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网络的关系	48
二、文化根植性、集群网络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67
三、文化根植性与创新能力关系：知识网络中介的实证	75
第五章 文化根植性与集群学习的关联机制	93
一、产业集群中的集体学习	93
二、文化根植性、集群学习与能力发展	101
第六章 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化	122
一、文化根植与集群学习的共演机制	122
二、文化根植性与集群创新网络演化机制	137
三、文化根植的变革路径与模式	165
第七章 适度文化根植与集群发展的协同	175
一、适度文化根植与集群发展协同的条件	175
二、适度文化根植与集群发展协同的关键	176
三、促进集群网络发展的适度文化根植	177

四、促进集群网络发展的适度文化根植	179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180
一、主要结论	180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182
参考文献	185
附录 企业调研问卷	205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在全国到处开花，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集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产业集群通过网络开放融入国际化产业链，有的则相对封闭而停滞不前，还有的产业集群逐渐萎缩最终走向消亡。综观世界各地的产业集群，其兴衰与所在区域的文化根植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①区域文化根植对产业集群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诱导和促进作用，如“硅谷文化”的创新精神、“第三意大利”的合作精神、浙江温州以“义利并举”为核心的永嘉文化等；②文化根植也可能制约甚至阻碍产业集群的发展，如美国“128”公路的衰落、中国浙江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文化”对外资企业的抵触。特别是过度的区域文化刚性不利于集群企业在全局范围内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削弱了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最后导致不同产业集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成长、稳定、衰退等不同演变特征。本书主要探究区域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变关联模式与机理。

具体地说，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为我国产业集群及集群内企业在全局化背景下实现升级提供参考。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正面临结构升级的巨大压力，改善区域文化成为产业集群克服发展瓶颈、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本书将比较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的演进历程，剖析文化根植性在产业集群演变中的作用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浙江省内多个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和深度剖析，考察集群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适时调整区域文化以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路径，提出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思路和对策。第二，为政府和相关组织制定产业政策，以及集群内企业寻求更有效的发展思路提供战略指导。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及其内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相关政府和组织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通过多地实地调研和多案例比较研究，揭示了现阶段阻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文化因素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特定要素，提出构筑适当根植、开放创新的集群文化等政策建议，以改善区域文化，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等对策建议。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深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集群演变的动态路径。以往研究在产业集群的组织形式、竞争优势及其实现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这种静态视角难以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不同产业集群的发展历

程。本书将从动态视角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不同产业集群演变的典型轨迹与特征,揭示导致产业集群呈现不同演变规律的内在原因,弥补了静态研究的理论缺陷,极大地丰富了产业集群研究。第二,全面剖析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演变的双重作用。现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兴起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合作、信任、集体学习等特定文化要素被认为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而很少有研究强调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升级演变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过于刚性的区域文化会制约或阻碍产业集群的升级。本书基于辩证二元性观点,全面剖析文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演变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机理。第三,创新性地提出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变的关联模式。揭示产业集群动态演变轨迹和文化根植性之间的关系,剖析两者之间相互关联作用的各种模式,基于历史分析方法提出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演变的基本特征,围绕基本特征考察不同产业集群演变与文化根植性之间典型的关联模式和机理,进而提出文化适度根植的观点,由此来寻求如何通过文化进化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整体思路。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以及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本书重点关注集群文化根植对于集群成长发展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本书主要拟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1) 文化根植的内涵、维度与测量。什么是集群文化根植,其嵌入主体、客体分别是什么?如何测量集群的文化根植?这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虽然嵌入性理论和文化根植概念(Zukin and DiMaggio, 1990)都被运用到对集群的分析中(James, 2003; James, 2005; 魏江和叶波, 2001),但这些研究存在理论缺口,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界定存在一定冲突,如认知嵌入和文化根植(Dequech, 2003);对文化根植客体的外延是区域文化、宗教文化,还是产业文化、共享的工作实践规范等,不同文献的规定也不一致(Gertler, 1995; James, 2003; James, 2005; Saxenian, 1990; 魏江和叶波, 2001)。同时现有的文献对于宏观层次的国家文化维度(Hofstede, 1980; Hofstede, 1983; Franke et al., 1991),微观层次的组织文化维度(Delobbe et al., 2002; Gordon and DiTomaso, 1992; Schein, 1984; van Den Berg and Wilderom, 2004)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基于中观区域文化维度的研究却缺少令人信服和公认的结论。虽然Hofstede曾说,研究国家文化的方法也适用于研究区域层次文化的分析,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土人情差异巨大,基于不同国家对比得出的国家文化维度很难直接用于我国的区域文化,因此,本书需要在扎根研究和质性编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文化维度的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文化根植测度的量表设计与开发。

(2) 文化根植对集群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主要从静态角度剖析文化根植的

作用机制。虽然集群研究者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了集群中的学习和创新,认识到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Lundvall, 1992; Wolfe and Gertler, 2001),学者们也发现不同区域文化对其集群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区域文化的因子既可能是集群学习、创新和良好网络形态的重要推动因素,也可能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文化根植的内在作用机制缺乏深刻的剖析,相关研究或停留在纯学理的规范探讨,或止步于对特定集群的案例研究(Saxenian, 1994; James, 2003),缺乏基于大样本的普适性研究。本书将通过实证分析,揭示文化根植性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的内在机制。

(3) 文化根植与集群动态发展的共演与协同。这个问题解剖为如下几个子问题:一是产业集群内的文化根植是如何演进的?其驱动力是什么?集群中文化过度根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文化根植性影响集群企业并导致集群整体演进的机理是什么,其影响结果是什么?三是如何实现文化根植与集群的协同演进?当前集群动态演进的研究,强调集群创新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当前水平和演进路径对集群的竞争优势的塑造和维系具有重要影响,这些要素不断向更高层次提升促使集群逐步演进。但从文化根植视角看,文化过度根植对集群发展具有阻碍作用(Granovetter, 1985; Grabher, 1993),只是现有研究并没有探讨过度文化根植性如何形成,特别缺乏对“文化根植如何演进并导致集群成长路径的差异性”的解释。由于集群创新的主体和绩效的最终体现都来自于集群企业,为了更准确而深入地探析集群整体发展的微观基础,本书先分析了文化根植对集群企业组织外部学习和网络的影响,进而探讨其对集群整体学习与网络演进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框架

根据以上研究主题,本书的全部内容包括八章。第一章明确研究目的与意义,并提出研究问题;第二章回顾相关的主要理论;第三章通过理论推演与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文化根植性的维度;第四章分析了文化根植性与集群网络的关联机制,进一步从网络结构视角出发,研究了知识网络作为文化根植性作用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第五章研究文化根植性与集群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机制,并从行为视角出发,揭示文化根植性、集群学习与集群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第六章对文化根植性与集群演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文化根植与集群学习和集群创新网络演化两方面出发,通过纵向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探析文化根植对集群演化的作用,并提出推动文化根植变革的路径模式;第七章从文化根植和集群发展的协同演进出发,探讨了适度文化根植与集群发展协同的条件、关键点,以及推动集群网络和集群学习适应集群动态发展要求的文化根植;第八章则研究主要结论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改进措施(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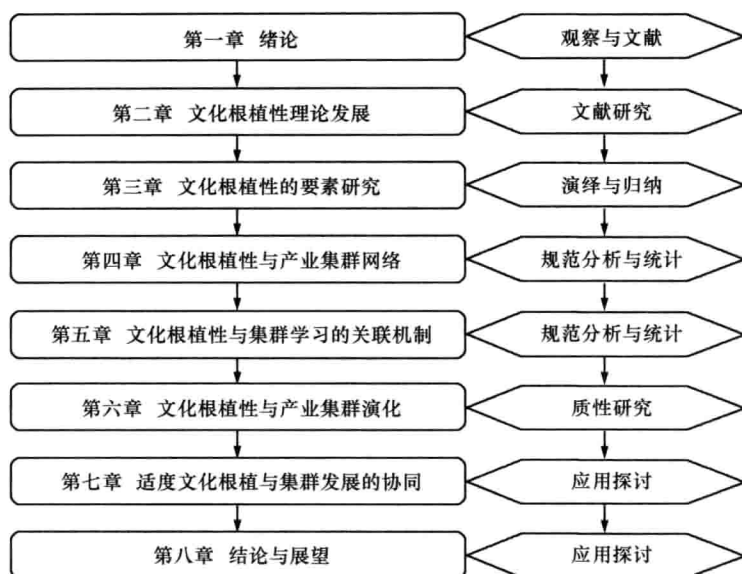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

第二章 文化根植性理论发展

一、根植性理论提出

根植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该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建立在对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它强调行为主体经济关系和行动受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背景的影响。网络根植性的研究主题包括网络形成、网络治理、网络演化、网络绩效等方面。目前，根植性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根植性的来源、机制和绩效等(Dacin et al. , 1999)。

(一) 理论渊源：新经济社会学

理论基本假设：社会经济人。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暗含了行为者的完全理性。但是，外部环境是动荡而复杂的，而人对外界信息的搜集、分析、处理能力有限，即人是有限理性的，即使人在行为意愿上是完全理性的，但行为本身和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这实际指出了动机理性与结果理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社会学领域将有限理性进一步拓展，指出不但个人自身能力具有有限理性，而且外部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也可能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并不完全受个人的理性动机决定，即个人行为的动机也可能受根植的社会背景的影响。1985年，在被认为是新经济学的奠基人的格兰诺维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根植的问题》，该文批判了与社会脱离的原子式的完全理性的个体“经济人”假设，与完全遵循惯例与价值系统的过度根植的“社会人”假设，提出了“经济行为根植在社会关系中”的著名命题。经济行为是个体经济人与根植于社会背景的社会人相结合的“经济社会人”，这种根植是具体的、特定的社会背景的根植，它既承认了个体的经济理性和理性差异，又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共同影响。

理论三大命题。1990年格兰诺维特又在《旧-新经济社会学：历史与议题》一文中，批评了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化过度观点，进而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大社会命题：①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②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的形式形成。之后他又与斯威德伯格于1992年在《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的引言中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①经济行为是社会行为

的一种特定类型；②经济行为具有社会性的定位；③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具体而言，命题一指出了经济行为是社会化的表现；命题二、命题三则指出社会背景对经济行为及行为预期和规制的影响。这三个命题分别从行为者、行为过程、行为结果角度，提出对行为人性、动机、行为的分析应从具体的背景出发，既考虑个体的差异，也考虑根植社会背景的作用。特别地，命题也暗含了经济社会学分析假设前提既不是传统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亚当·斯密），也不是“有限理性人”（西蒙），而是根植于社会背景的“社会经济人”，这种根植是具体的、特定的社会背景的根本。其实质强调经济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行为动机包括经济动机，也包括社会动机；经济行为受社会背景和关系的影响，后者决定前者的动机和资源活动，决定经济行为的制度是人们社会行动的结果，它反过来又影响人们之间的行动过程。

（二）基市内涵与类型

根植性的内涵。根植性又称嵌入性，它被定义为在经济和非经济参与者（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反过来造就独特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模式（Hess, 2004; Jessop, 2001; Zukin and DiMaggio, 1990）。根植性的概念首先由 Polanyi (1944) 在他的《伟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提出。Polanyi 区别了社会中的三种经济交换类型：互惠的、再分配的和市场的，其均以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特定根植模式为特征。在 Polanyi 之后，Granovetter 在 1985 年中发展了这种观点。他强调经济行为者根植于发展着的具体社会关系中，批判了根植不足的原子式的完全理性的个体“经济人”假设，与完全遵循惯例与价值系统的过度根植的“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服从于共同发展的惯例和价值观的指引，通过社会化使之内化，即将人完全看成是遵从社会观念的失去个性的“社会人”，进而提出了“经济行为根植在社会关系中”的著名论点。实际上 Granovetter 的观点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既受实际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具有“社会人”的一面；同时又是带有个体差异的“经济人”，并且这种根植关系处在变化之中，应从发展动态的角度考察根植背景条件的变化。

根植性的类型与维度。根植性概念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回答“谁”（根植主体）根植于“什么”（根植客体）。根据不同的根植主体、客体以及根植的范围和层次等，根植性可被划分为不同的根植类型。Granovetter 和 Swedberg (1992) 以及 Rowley 等 (2000)、Glückler (2001) 从根植范围上区分了关系根植与结构根植。关系根植指参与者关系的特性或质量；结构根植指在众多参与者形成的关系网络结构（Hess, 2004）。前者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主要从关系的内容、方向、延续性及强度等方面来度量。后者则是互动双方各自成为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主要从关系联结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及密度等方面来测度